

论江万里在南宋书院发展史上的贡献

徐明德¹, 江梓荣², 江裕英³

(1. 浙江大学 历史系, 浙江 杭州 310028; 2. 协通公司, 香港;

3. 深圳华粤电子器件工业公司, 广东 深圳 518038)

[摘 要] “书院”始于唐代, 经过五代、北宋的发展, 至南宋达到鼎盛时期。江万里肄业于白鹿洞书院, 又入太学上舍深造。进士及第后, 历任州、府、路和中央部院长官, 直至左丞相兼枢密使, 其间任过教授、国子监祭酒、侍读、侍讲和书院山长, 对官学和书院教育有深厚的实践经验。江万里在南宋书院发展历史上的主要贡献是 (1) 以白鹿洞书院为楷模, 创办了“白鹭洲书院”、“宗濂精舍”、“道源书院”等全国一流书院; (2) 大力提倡教育兴国, 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。仅吉州继文天祥后, 又有 17 名学子荣登进士科状元, 至明清共有 2 728 名学子进士及第, 故吉州享誉“南宋进士的摇篮”。江万里十分重视书院教育, 并为我们留下了可贵的历史借鉴 (1) 重视思想教育, 是南宋书院教学的灵魂; (2) 提倡学术研究, 要求书院既出人才又出成果。

[关键词] 书院; 精舍; 理学; 祠堂; 进士科; 江万里; 朱熹; 南宋

[中图分类号] G649.2999 [文献标志码] A [文章编号] 1008-942X(2004)03-0081-07

一、南宋是中国书院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

我国“书院”之名始于唐朝中期, 是朝廷校理经籍的官方学术机构, 如“丽正修书院”、“丽正书院”、“集贤殿书院”等, 其任务是帮助皇帝了解经史典籍, 并承担了举荐贤才和提出国政方面种种建议的使命, 供皇帝选用和参考。因为书院又是中央政府收藏图书的场所, 所以有些官僚致仕后, 为夸耀乡里, 将自己藏书治学的地方也称为书院。如开元年间曾任集贤院学士的徐安贞告老回乡后, 在浙江龙游建“九峰书院”^[1]。这样, 书院名称由官方学术机构变成了私人藏书治学的场所。汉朝开始, 私人治学授徒的地方一直称“精舍”、“精庐”, 南北朝后佛教盛行, 不少佛教经师把自己传经授徒之处也叫“精舍”、“精庐”, 以至僧俗不分。唐开元后, 书院的出现受到了士大夫的欢迎, 在唐朝后期的一个半世纪中, 有文献记载的书院就有 34 所, 这是书院发展史上的萌芽时期, 其特点有二: 先是个别书院已兼有教学的职能, 如江西永丰的“皇僚书院”, 是吉州通判刘庆霖“流寓永丰, 建以讲学”^[2]之处, 义门陈尧在江西德安建的“东桂书院”, 也“聚书千卷, 以资学者, 子弟弱冠悉令就学”^[2]; 二是现任地方官开始在任所创建书院, 如岭南节度使韦皋在贞元年间于大渡河创建的“海棠池书院”。

[收稿日期] 2003-09-18

[本刊网址·在线杂志] <http://www.journals.zju.edu.cn/soc>

[作者简介] 1. 徐明德(1935-), 男, 浙江德清人,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, 主要从事明清史、中国古代史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; 2. 江梓荣(1932-), 男, 广东德庆人, 香港协通公司董事长, 江西江万里研究总会副会长, 江万里第 20 代裔孙, 主要从事江万里研究; 3. 江裕英(1939-), 男, 广东德庆人, 深圳华粤电子器件工业公司高级工程师, 深圳江万里研究会副会长, 江万里第 20 代裔孙, 主要从事江万里研究。

北宋初年,继五代十国战乱之后,官学衰微,人才匮乏;故饶有学识者,则设帐授徒,富有经济者,则开馆延师[3]。私人讲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,书院教育便在各地逐渐兴起,于是书院进入初期发展时期。据南开大学白新良教授考证,北宋有书院71—100所,江西独占23所之多[4](pp.4—6)。北宋书院发展的原因,是社会安定、经济繁荣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。当时官学普遍废弛,中央政府忙于统一战争,没有余力兴办官学教育,只能依靠私人教育的书院形式来培养人才,加上周敦颐、张载与程颢、程颐的道学对维护封建统治有着重要的意义,兼之这些代表人物学识渊博,品行敦厚,足以为人师表,于是朝廷大力支持,赐书、赐匾、赐田、赐予官职等等,如太平兴国二年(996)赐“印本九经”于江西白鹿洞书院。又“官(白鹿)洞主明起为褒信县主簿[5]。宋真宗咸平四年(1001),命国子监赐书岳麓书院。仁宗天圣二年(1035),赐金坛茅山书院田三顷;充书院贍用[6]。这是对书院教育公开表示认可与支持。北宋中期以后官学渐趋完备,一些有名的书院如江西白鹿洞书院、长沙岳麓书院、商邱应天书院等皆被强制改为官学。但新建书院仍不断出现,其特点是教学职能普遍增长、提高,书院内部结构也渐趋完备,不少书院设山长主持书院讲席,白鹿洞书院则以政府赐书为基础,建立了自己的藏书机构——书楼,皇祐中“四方来学者,并给廩饩[7]。但书院的地位仍在官学之下。

南宋(1127—1279)堪称中国书院发展史上的极盛时期。南宋统治的十一省区,书院总数达到500所以上,江西是当时全国书院教育最发达的地区,有书院147所,浙江是京城所在地,也只有书院82所;另外,福建57所,湖南43所,广东35所,江苏23所,安徽、四川各18所,广西11所,湖北9所,贵州1所。南宋书院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是南渡后官学数量有限,无法满足广大士人的求学要求,特别是朝廷取士的惟一正途是科举,不但刺激了书院的发展,而且正好适应了这一文化发展的趋势。其次是雕版印刷术进一步普及,书籍广泛流通为书院发展创造了条件。第三,官学和科举日益腐败,刺激了书院的发展。理学大师朱熹对当时的国家最高学府是这样评价的:“所谓太学者,但为声利之场,而掌其教事者,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。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,其奔趋辐凑而来者,不过为解额之滥,舍选之私而已。师生相视,漠然如行路之人,间相与言,亦未尝开以德行道艺之实,而月书季考者,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。”[8]第四,理学的广泛传播,直接推动了书院的发展。朱熹、陆九渊等一大批理学名师登上学术舞台后,把道学发展到理学阶段,更加重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,普遍借用书院进行讲学。在他们的带动下,到宋孝宗以后,各地出现了书院林立的局面。第五,朝廷大力支持,书院地位高于官学,成为学术研究中心。嘉定五年,宋宁宗下旨:“以朱熹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集注立学。”[9]嘉定十三年,又“追谥周敦颐曰‘元’,程颢曰‘纯’,程颐曰‘正’,张载曰‘明’”[10]。宋理宗即位后,又以朱熹《四书集注》:“发挥圣贤之蕴,羽翼斯文,有补治道”;“读之不释手,恨不与之同时”,故特赠朱熹为太师,追封信国公,旋改徽国公[11]。不久又将周、张、二程和朱熹一起从祀学宫[12]。这样,程朱理学一跃成为南宋政权的官方正统思想。

南宋书院的特点有三:一是书院内部组织结构更加完善,有山长、生徒、斋舍、藏书等,山长下有副山长,其下设堂长、堂录、讲书、职事各职,分管教学和维持纪律。教学安排规定每旬三八讲经,一六讲史,每月三课,上旬经疑,中旬史疑,下旬举业。考试讲究月试积分。二是书院内祭祀对象多元化,摆脱官学影响,富有书院特色。除祭祀儒家先师先贤之外,忠臣、名宦、乡贤,以及北宋以来著名的理学大师也列入书院祭祀的对象,如唐朝的狄仁杰、韩愈,宋朝的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、苏轼、邵雍、李纲、游酢、洪皓、朱熹及其祖朱森、父朱松,还有李侗、杨时、胡安国、张栻、陈灌、吕祖谦、陆九韶、陆九龄、陆九渊、杨简、楼昉、曾兴宗等。三是书院有了固定的经济来源。如官府拨田、官吏捐俸、主办学及门生自筹等,都以资金购置田产出租,以收取租息供师生膏火之需。

二、江万里在南宋书院发展史上的贡献

唐、五代以后,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,长江以南不但地方富庶,经济繁荣,而且文化发达,人才辈出。但是最富庶的太湖流域,在南宋时期文化的发展远远不如江西,特别是具有时代特色的书院教育。究其原因,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三要素中,还是人的作用最重要。笔者认为,理学大师程颢、程颐、朱熹和陆九渊等人以及他们的门人,在江西广泛传播理学,积极兴办书院,是江西书院教育繁荣昌盛的重要原因。如朱熹于宋孝宗淳熙六年(1179)出任南康知军后,立即修复庐山五老峰下的白鹿洞书院,聘杨日新为堂长;“奏赐敕额及太上皇帝(宋高宗赵构)御书石经版本、九经注疏,遍求江西各郡文字藏之,又置田以赡学者,每休沐辄一至,诸生质疑问难,诱诲不倦,退则相与徜徉泉石间,竟日乃返”〔13〕。同时为了活跃学术空气,特邀与自己持不同学术见解的陆九渊、刘清之、林择之等著名理学家到白鹿洞书院来讲学。经过朱熹的一番整顿,白鹿洞书院很快成为南宋各地书院的样板,书院生徒一时达到数千人,跃居全国四大书院之首。当时的书院不但是教育机构,也是学术研究机构,他们在政治上多少代表“清议”,批评朝政。同时,书院既是理学家讲学的场所,又成为纪念理学大师的地方。光宗绍熙五年(1194),朱熹调知湖南潭州(今长沙市),又于公务之余,修复荒芜已久的岳麓书院,然后“穷日之力治郡之事甚劳,夜则与诸生讲论,随时而答,略无倦色,训以切己务实,毋厌卑近而慕高远,恳恻至意,闻者感动”〔14〕。在朱熹等理学名儒热衷于书院教学的推动下,创建和修复的书院便蓬勃涌现,仅仅朱熹和他信徒所创建、修复的书院就达一百多所。

江万里肄业于白鹿洞书院,出身于朱熹高足林夔孙的门下,是朱熹的再传弟子。林夔孙,字子武,号蒙谷,福建古田人,是一位具高风亮节、品学兼优的程朱理学嫡系传人,在程朱理学遭到打击时,他仍坚信不疑,史载:“党禁起,学者更事他师,惟夔孙从熹讲论不辍。”朱熹另两位高足中,饶鲁是江万里外公陈大猷的恩师、舅父陈湜的太老师,陈氏父子都是当时的理学名儒;陆德舆,与江万里是厚交,曾为万里辩冤。所以,江万里从小耳濡目染朱熹学说,可谓是真传。他一生的言行举止也都以朱熹为榜样。

江万里从小跟随父亲和祖辈习《周易》,又“听乃祖讲《论》、《孟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,夫人(祖母)点记要语,时时申戒,俾勿忘”〔15〕。18岁进江南最高学府——白鹿洞书院,师从林夔孙,24岁肄业,善治《周易》。然后游学隆兴府东湖书院,25岁到临安(今杭州市)入太学上舍深造,文声颇佳,连太子赵昀(后来的宋理宗)也非常赏识他,“尝书其姓名几研间”。29岁举进士及第,其殿试策论《子仪单骑见虏》一文,见解精辟,文笔洗炼,全文一千三百余字,使主考官称赞不已,批语道:“写得子仪心事出,立意深而措词妙,叹惜之意溢于言表,高古之文也”,一时成为脍炙人口的杰作,被宋代京学教谕魏天应编入《论学绳尺》中的《论诀》卷,成为当时太学生必备的应试辅导资料,到清代《论学绳尺》还被收入了《四库全书》。这就是程朱理学在书院式教育下培养出来的真材实学的典型代表。如果为了当官,江万里在太学上舍毕业后,以他优异的成绩,可由皇帝直接授予差遣,但他仍然参加科举考试测试自己的才华。江万里中进士后先在秘书省供职4年,至33岁外放池州(州治在今安徽省贵池县)文学教授。39岁除秘书省秘书郎兼庄王府教授,40岁除著作佐郎兼沂靖惠王府教授,47岁迁驾部郎官、尚书右郎兼侍讲,49岁拜监察御史兼侍讲,62岁兼国子监祭酒、侍读。可见,江万里对官学和书院教学情况了如指掌,对当时国家的弊病也有深刻的理会,于是从根本上促使他积极创办书院,努力培养人才,大力提倡教育强国的主张和实践,总而言之,江万里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。

(一)以白鹿洞书院为楷模,创办了全国第一流书院

宋理宗淳祐元年(1241),江万里知吉州军兼提举江西常平茶盐任上,看中吉州城东赣江中的白鹭洲独立于江之中心,两水平分,景色宜人,古刹梵寺林立,是办学育才的理想场所,便借用唐代诗人李白“二水中分白鹭洲”佳句,以其师朱熹为楷模,依照白鹿洞书院的规模和体制,创建“白鹭洲书院”,并筑文宣王(孔子)殿、棣星门、云章阁(藏书楼)、道心堂、万竹堂、风月楼、浴沂亭、斋舍、庖廩和六君子(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邵雍、张载、朱熹等六位理学名儒)祠等,规模宏大,可容生徒数百人。于是广泛收藏图书,广招生徒;置田租八百石有奇,绕城壕池,岁入租银五十两贍生徒^[15]。他自任山长(书院负责人,又称堂长),亲自为诸生讲授经文。由于这座书院规模大,藏书丰富,又地处吉州经济文化之中心,一时成为学者云集之所。宋理宗御笔赐额“白鹭洲书院”,又书对联曰:“智水仁山日日当前呈道体,礼门义路人人于此见天心”,与白鹿洞书院、鹅湖书院并称为“江西三大书院”。直到清代仍与白鹿洞书院、鹅湖书院、友教书院齐名,为“江西四大书院”之一。

淳祐二年(1242),江万里升迁江南西路转运判官(又称漕臣)兼权知隆兴府,又在府城望云门(今德胜门)外龙沙岗(唐观察使路嗣恭故宅)再创建“宗濂精舍”,收聚生徒,讲学其中,并建周濂溪(敦颐)先生祠,宋理宗再赐“宗濂精舍”匾额。

同年,江万里又嘱托南安(今南安县)知军林寿,在东山王文公祠后,将大庾县(今大余县)原“三先生(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)祠”扩建为“周程书院”。至宝祐五年(1257)改名“道源书院”。景定四年(1263),宋理宗第三次为江万里所创书院赐额,称“道源书院”,建云章阁藏书,设租田贍助学者。

作为一位知州和知府,能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,接连创办三所著名的书院,并获得当朝皇帝再三御赐匾额,这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,确是不起的大事。

(二)大力提倡教育兴国,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

江万里从政38年,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。他首任外差便是池州教授,接着担任过两处王府教授、翰林院侍讲、侍读,为皇帝讲读史书,解说经义,备顾问应对,又两度兼任全国最高学府管理机构国子监祭酒等。69岁至70岁遭奸迫害寓居饶州时,又受黟县江村族长邀请到江南东路黟县石鼓寺教授江氏弟子,江寅简、江一鶚在他的精心指导下,双双荣登进士科金榜。江万里对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性认识非常深刻,提出了教育兴国的主张。他在白鹭洲书院《聘堂长书》中明确指出:“某自入境以来,允惟教化,为政务先。”在国子监祭酒任上撰《跋景定元年更学令御札》时,反复强调只有重视学校教育,才能广出人才,他说:“臣闻天地之于植物,栽者培之,自拱把合抱以至于耸壑昂霄,无不能尽其材者,此天地成物也。本朝列圣,开设雍庠(学校),士出此途,蔚为时栋,光明硕大,与国无穷,所得于所养,如鹤鸣子和,声与响随。设遇缓急之机,否臧之决,油然而忠爱不能自己于中,而平时自淑身心,不使有一毫出于规矩尺度之外。教养之功,于斯为盛。”^[16]至于如何办好书院,提高教育质量,他的主张是改变只为应付课试和科举考试的浮夸学风,提倡“实学”。江万里在《聘堂长书》中指出:“此州(指吉州)尚有文献,士每可以语道者,独恨学业夺,讲贯课试诱争竞,故向上义理,闻者寝稀。”提出要聘任胡楚浚这样有真才实学的人来担任山长,改变为课试而课试、为科举而科举的腐败风气,注重“实学”。他认为,读书应该穷理,“诵其书”须“学其所以为教”,做到“心领意会”。胡楚浚在《答古心公聘堂长书》中说:“今先生以一世之贤,为庐陵之师帅,以正传之道,新庐陵之声游。”“鹭州(洲)岂故鹭洲也乎?翼然有堂,俨然有师,然有徒。先生招诸生而诲之,某亦与一人焉。敢以书谢?然弟子于先生,不取其私谢,而取其不负。”何谓幸?亲见先生而师之是也……沐其教,嗜其学,负之尤不可。”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,他给文天祥父亲撰写《革斋先生墓志铭》时,阐明学校教育终于造就了文天祥这样一代捍卫国家的栋梁之才。他写道:“宝祐丙辰,进

士试御前,上览对言,亲擢第一人,赐及第,胪传而名之,为庐陵(吉安)文天祥……予尝受郡印于兹土矣,惟学校之化滋,急士相厉,其为四海之广,而往往擅魁特焉。然一第未也,少年论天下事,无不尽刊,春华以既秋实,器端识远,更可为贵珍耳。”文天祥考取状元后,考官王应麟评论其殿试策论:“是卷,古谊若龟鉴,忠肝如铁石,臣敢为得人贺。”^[17]这便是江万里推重实学所取得的成就。江万里的再传弟子与幕僚刘辰翁在《白鹭洲书院江文忠公祠堂记》中,对他的教育思想与业绩作了高度评价,称江万里的学识和品行,使“缙绅德之,吏民怜之,悍卒化之,去之”。

江万里非常重视书院山长的选择,他的择师标准是:行谊正、品格高、学问深,三者缺一不可。他选拔胡楚浚及其门人欧阳守道先后担任山长,以乡贤文忠公欧阳修、忠襄公杨邦义、忠简公胡铨、文忠公周必大、文节公杨万里等“四忠一节”为效法的楷模,相互砥砺,使书院学风和生徒的学业迅速提高,白鹭洲书院很快成为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。宝祐四年(1256)进士科殿试,白鹭洲书院文天祥夺魁中头名状元,同时有43名吉州考生与文天祥同科进士及第。六年后,即景定三年(1262),白鹭洲书院又有刘辰翁、邓光荐等47名吉州学子跃登进士科金榜。白鹭洲书院优秀的教育质量也促进了吉州地区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,继文天祥之后,又有17名吉州籍学子先后荣登进士科头名状元,经过明清两代,已有2728名吉州学子考中进士,出类拔萃者,更以万计。欧阳守道在《白鹭洲书院山长厅记》中便说:“吾庐陵士至二三万。”刘辰翁更一针见血地指出,古心“先生闲居,其志念在国家,其精神在庐陵”^[18]。

三、江万里在书院教育上为我们留下了可贵的历史借鉴

以朱熹、江万里、文天祥等为代表的南宋时期的三代师生,都是出身于书院教育的爱国主义者,他们的品行学识都是第一流的,千百年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。那么,江万里推重的书院教育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?这是我们今天研究江万里和我国书院发展史的重要课题。现笔者提出两点看法求教于方家。

(一)重视修身养性的品德教育,是南宋书院教学的灵魂

朱熹在《白鹿洞书院揭示》中明确规定了书院教育之目的,提出了做人、求学、处事的行为规范和行动准则,再三强调修身养性的必要性与重要性,按现在的话说是加强品德修养,提出以“父子有亲、君臣有义、夫妇有别、长幼有序、朋友有信”为“五教之目”;以“博学之、审问之、慎思之、明辨之、笃行之”为“为学之序”;以“言忠信、行笃敬、惩忿窒欲、迁善改过”为“修身之要”;以“正其义不谋其利,明其道不计其功”为“处身之要”;以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;行有不得,返求诸己”为“接物之要”^[13]。江万里把《白鹿洞书院揭示》张贴在《白鹭洲书院》的“道心堂”上,坚决遵照其太老师的要求,加强对生徒的品行修养教育。朱熹在《朱子语类》和《朱子大全》中保留的有关书院教育的主要目的,是培养有道德的人,他说:“学者须以立志为本”;“德而不才,德非其德;才而不德,乃才之贼”,“圣人千言万语,只是要教人做人”;“富贵易得,名节难保”。

书院又设祠堂,不但祭祀儒家先师先贤,而且对忠臣、循吏、名宦、乡贤和北宋以来的理学大师进行顶礼膜拜,成为每个学生效法的榜样。书院培养出来的人才,不但是经师,而且也是人师。朱熹、江万里、文天祥、刘辰翁、邓光荐等,都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。江万里留下的278字的《江文忠公家训》,实际上是他太老师朱熹《朱子格言》的一部分。《康熙江氏大成宗谱》卷一如此写道:“父之所贵者,慈也;子之所贵者,孝也。君之所贵者,义也;臣之所贵者,忠也。兄之所贵者,爱也;弟之所贵者,敬也。夫之所贵者,和也;妇之所贵者,柔也。事师礼,贵乎礼也;交朋友,贵乎信也。见长者敬之,遇幼者爱之。有德者年虽下于我,我必敬之;不肖者年虽高于我,我必远之。仇将以义解之,怨

者以直报之。人有恶则掩之,人有善则扬之。人有小过含而容忍之,人大过以理而责之。勿以恶小而为之,勿以善小而不为。处公无私仇,治家无私法。勿损人而利己,勿妒贤而嫉能。见非义之财则勿取,遇合义之事则从。诗书不可不学,礼义不可不知,子孙不可不教,奴仆不可不恤。守我之分者,理也;听我之命者,天也。人能如是,天必相之。此乃日用常行之道,若衣服之于身体,饮食之于口腹,不可一日无也。可不谨哉!可不谨哉!〔19〕这就是南宋时代做人的基本准则。江万里、文天祥等人便是按这种思想培养出来的民族英雄,这样的育人理论在今天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,值得今人引以为鉴。

(二) 提倡学术研究,要求书院既出人才又出成果

程朱学说在南宋又称“理学”,被誉为“儒学正宗”,实际上它是集儒、释、道三家学术思想之大成者。江万里始终坚持程朱学说,注重经世致用。他钻研理学,想从中探索一条救国之路。故针对当时社会的腐败现象,主张“理”应胜于“欲”。他反对书院教育为科举而科举,提倡深入钻研,培养学者型的人才。就吉州而言,当时大批士子考取进士,其中有18人考取状元,德才兼备者比比皆是,爱国主义者层出不穷,很多士子都有著作留存于世。对今天来说,这是一笔巨大的无以估价的精神财富和文化财富。

白鹭洲书院初创时期,江万里特邀进士及第而未仕的刘南甫到书院讲授,刘南甫对书院教育和官学教育的不同之处深有体会。他说:“科举累我久,人生得婆娑林谷,贮满腹书足矣,何用他求?”后来他出任醴陵、安远二县主簿,去淫祠、平冤狱,人称“神明”,著有《论稿》一书。江万里门人欧阳守道为其作序时常给予高度的评价:“精敏绝人,而自视欲然。〔20〕”欧阳守道有《巽斋文集》留世,他的文笔深受江万里称赞。江万里看了欧阳守道代其撰写抗金民族英雄欧阳珣事迹的《监丞祠堂记》后,赞叹不已,称道说:“如茗永在吾颊舌间”。其弟子文天祥不但是状元出身,而且是著名的民族英雄,有《文山先生全集》留给后人,门人刘辰翁跟随江万里15年,深受江万里器重,著有《须溪集》存世,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,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,门人邓光荐积极响应文天祥抗元,崖山兵败被俘,与文天祥被押解金陵后,重病迁寓天庆观就医,文天祥殉国后,他到处宣传文天祥的英雄事迹,与文天祥、刘辰翁被誉为“白鹭洲书院三杰”。由于江万里等人对书院教育的杰出贡献,遂使吉州享誉“南宋进士的摇篮”之称。

[参 考 文 献]

- [1] 沈杰.弘治衢州府志·卷四[Z].明弘治十六年(1503)刻本.
- [2] 蒋廷锡.陈梦雷.古今图书集成·职方典·卷八七五、卷八[M].北京:中华书局影印本,1934.
- [3] 脱脱.宋史·卷一五六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7.
- [4] 白新良.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[M].天津:天津大学出版社,1995.
- [5] 陈霖.南康府志·卷四[Z].明正德十年(1515)刻本.
- [6] 张铉.金陵新志·卷九[Z].元至正四年(1344)刻本.
- [7] 刘坤一,刘铎,赵之谦.江西通志·卷八一、卷八二[Z].清光绪七年(1881)刻本.
- [8] 朱熹.朱文公集·卷六九[M].《丛书集成》初编文学类.
- [9] 脱脱.宋史·卷一五七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7.
- [10] 毕源.续资治通鉴·卷一五九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0.
- [11] 毕源.续资治通鉴·卷一六四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0.
- [12] 毕源.续资治通鉴·卷一七〇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0.
- [13] 王懋肱.朱子年谱[Z].清乾隆白田草堂本刻本.

[14] 袁甫. 蒙斋集墓志铭·江夫人巢氏墓志铭. 卷七[M].《四库全书》本集部别集类. 清乾隆三十年辑.
[15] 李兴元. 欧阳主生. 吉安府志. 卷一五[Z]. 顺治十七年(1660)刻本.
[16] 潜说友. 咸淳临安志学校. 卷一[Z]. 道光十年(1830)钱塘汪氏绮堂刻本.
[17] 脱脱. 宋史·文天祥传. 卷四一八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7.
[18] 刘辰翁. 须溪集·白鹭洲书院江文忠公祠堂记[M].《四库全书》本集部别集类. 清乾隆三十年辑.
[19] 康熙江氏大成宗谱. 卷一[Z]. 江西都昌藏本.
[20] 欧阳守道. 巽斋文集·刘山立《论稿》序. 卷七[M].《四库全书》集部别集类. 清乾隆三十年辑.

On the Contribution of Jiang Wanli to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es of Classical Learning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

XU Ming-de¹, JIANG Zi-rong², JIANG Yu-ying³

(1. Department of History, Zhejiang University, Hangzhou 310028, China ; 2. Hongkong Xietong Corporation, Hongkong, China ; 3. Huayue Electronic Device Corporation, Shenzheng 518038, China)

Abstract :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, originating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developing in the Five Dynasties period through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, reached its heyday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. Mr. Jiang Wanli , after studying in Bailudong Academy , furthered his studies at the Imperial College . Having become jinshi (a successful candidate in the highest imperial examination) , he was appointed as senior official of the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s , Vice Prime Minister and Military Affairs Commissioner . Meanwhile , he served as head or instructor of the local Confucian school and the Princely Establishment , chancellor of the Imperial College , Emperor ' s lecturer and dean of the academy . Therefore , he was practically experienced in palace school education and academy education . His major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Song academies include the founding of China ' s three leading academies (Bailuzhou , Zonglian Jingshe , and Daoyuan) and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to make China strong . For example , Jizhou Prefecture known as the cradle of jinshi ' 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, which had produced 2 728 jinshi ' s by the Qing Dynasty . There is a lot to learn from Jiang Wanli , notably two points as follows : (1)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is the soul of the academy education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. Bailuzhou Academy clearly defined the aim and requirements of its education , laying down the principles and norms concerning academic pursuit and the conduct of students . He emphasized that students should be aspiring and upright . (2) Academic research is advocated to ensure the proper training of students and academic production . He promoted the doctrine of Cheng Yi and Zhu Xi , regarded as one of the schools of Confucianism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, which actually featured the combination of Confucianism , Buddhism and Taoism . Moreover , he paid due attention to the practical knowledge of managing state affairs , from which he tried to learn to explore the path of saving the country . He believed that the Cheng-Zhu doctrine was bound to prevail over desire , while opposing the academic education just for the sak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advoc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holar-type students .

Key words :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; study (school) ; Confucian school of idealist philosophy of the Song Dynasty ; memorial hall ; jinshi course ; Jiang Wanli ; Zhu Xi ;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